

四川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文化

继承与创新研究

ZHONGGUO ZHIXUE WENHUA

杨翰卿 著

JICHENG YU CHUANGXIN YANJIU



NLIC297083806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文化 继承与创新研究

ZHONGGUO ZHIXUE WENHUA

杨翰卿 著

JICHENG YU CHUANGXIN YANJIU



NLIC29708380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与创新研究 / 杨翰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161-0282-4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哲学-继承-研究-中国
②哲学-知识创新-研究-中国③文化-继承-研究-中国④文化-知识创新-研究-中国 IV. ①B2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3941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75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

方克立

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1988年，我在新加坡的一次儒学会议上作了题为《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的发言，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现代新儒家在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批评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根本不相容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指出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①

这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实际上是新儒家唱主角，也有自由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三派进行了直接的交流与交锋。我在会上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必然要复兴，但这个复兴不能以儒学和新儒学为指导，而必须以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需

* 本文原为方克立先生2010年3月26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庆典大会上的发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红旗文摘》2011年第1期转载。这里将原文稍作改动。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要明确一点，就是在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传统，而是明确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现代新儒家指责五四运动造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充分证明，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我在发言中提出了“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明确肯定。因为中国文化首先必须是充满活力与自信的、富有包容性的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它才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有的新儒家学者说“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儿，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其体是马列”，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有多重涵义，近代以来谈文化体用问题往往不加区分，所以众说纷纭，歧义丛生。传统文化体用观认为：“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胡瑗）这是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而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的，即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现代新儒家讲“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不过是其翻版而已。这是从以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谈体用的观点沿袭下来的，运用到文化上，一般是以精神文明为体，以物质文明为用。在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不只具有这一重涵义，它还有更加原本的一重涵义，就是指本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朱熹说：“用是他用处。”王船山说：“用者，用之于天下也。”形质神用（范缜）、器体道用（王船山、谭嗣同）、“物质为体，精神为用”（孙中山）、“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张岱年）、“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冯友兰）等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李泽厚“西体中用”论中的体用范畴，也接近这个意义。他说：“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西方在这个方面有明显优势，而“中用”则是把代表西方文明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经制度等等运用于中国。“西体中用”论与“中体西用”论

表面上看似似乎针锋相对，其实体用范畴的涵义并不一样。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涵义之外，体用范畴还有必然与偶然、内容与形式、因与果、常与变、主与辅等多重涵义。不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谈体用关系，其本来精神都是强调二者的连接贯通、对立统一，但也都预设了“体”的优先地位，中西体用之争争的正是这个优先地位即所谓“体”的层位。

正是由于体用范畴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谈文化问题时宜慎用体用范畴，如果要用也首先要将其涵义界定清楚，否则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双方可能完全不相应。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古今、中西等不同角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体用关系大不一样，甚至会出现王船山所说的“相与为体”或“相为体用”的情况。

我们肯定中国文化是“接受主体”，从“洋为中用”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被主体所接受并为主体所用的外来文化，是一种“他山之石”，因此也可以归入“西用”的范畴。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发展能够起到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它决定了中国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其他“西学”之用又是不同的。按照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代科技等西学是用。张岱年、程恩富等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马体西用”的。

另一方面，从“古为今用”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今”，处于“体”的地位；国学、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古”，经过科学分析，区分“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所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国学、儒学都看作是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难套进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用模式，确定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因为在不同的意义上，它们分别具有“体”的优位性。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理论模式，不是把它们放在体用二元、互相对立的位置上，而是要把二者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统一起来，这就使我们想到了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理论。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张先生就注意研究中、西、马三大思潮的关系问题，先后提出了“创造的综合”说与“文化综合创新”论，在这项

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四年前,我在学习张先生的文化思想时曾将其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试图以“魂、体、用”三元模式代替“体、用”二元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综合起来,来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各自的价值与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所谓“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①“马魂、中体、西用”论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又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我认为是一种比较符合今天中国实际的文化发展方针和理论模式。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才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使中国文化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

这种看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包括北京大学的董学文教授;也有学者提出一些问题,对于这种认识的完善和深化非常有帮助。肯定的意见主要是:面对中、西、马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当代中国文化格局,“魂、体、用”三元模式确实比“体、用”二元模式有更强的解释力,“马魂、中体、西用”的概括也比“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更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魂、体、用”三元模式有没有学理的和现实的根据呢?我是受到王船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启发,而考虑到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它实际上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下之器”(科技等现代西学)的那个“形”。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必须为中国文化所接受,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作用。按照王船山“道器无易体”、“统之乎一形”的理论,统一形上与形

^①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下的那个“形”也就是统一道与器的“物之体”，我们用“中体”（“中学为体”）来表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涵义是十分恰当的。为了把两种不同涵义之“体”区分开来，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概念“魂”来表示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体”，类似日本“和魂洋才”思想中“魂”的概念。概念上的这一区分和变通使用，恰恰是将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在“魂、体、用”三元模式中结合起来了。至于这种理论模式的现实模型，我们已经找到许多，在思想史上也不乏其例。比如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他的学生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放到儒家“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文化价值体系中，都是顺理成章、很容易理解的。

人们提得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马魂、中体、西用”论仍然沿用了“中体西用”的提法，其涵义与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有什么区别呢？前面已经提到，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它是一种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守主义理论。正如严复等人所批评的，其割裂体用的错误非常明显。因为中学和西学都各有其体用，其“体”与“用”都是统一的，就像牛有负重之用、马有致远之用一样；现在非要把西学之用与中学之体嫁接在一起，那么也就像“牛体马用”一样可笑。一百多年来，“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曾一再受到批判，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它总是批而不倒，其影响至今犹存，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种情况正是由于体用范畴的多义性所造成的。因为“中体西用”虽然是晚清人提出来的，其本意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旧文化，但是它作为一个处理中西（外）文化关系的思想模式提出来，除了这种特定意涵之外，还包含着肯定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意义。就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被接受的外来文化的关系来说，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实际上就是“中体西（洋）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在否定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意涵的前提下，而突出地强调了其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

试图用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式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做出准确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很有必要。因为一百多年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口号影响很大，实际上就是打出了

一面面文化旗帜，力图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旗帜。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面文化旗帜下，对中、西、马在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定位，因此也可以说是“综合创新”论的深化。在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任何理论模式都是有局限性的，“体、用”二元模式有局限性，“魂、体、用”三元模式也有局限性，它们都只能有条件地说明一定的事物、现象和关系，而不能夸大其适用范围和解释效力。“马魂、中体、西用”还是一种需要发展、完善和在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所以我非常愿意与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研讨，也非常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和指教。

自序

在刚跨入新的 21 世纪时，我主持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当代开发利用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 00BZX023），最终成果以《中国先进文化继承创新论》付梓出版。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继承和创新的看法。此后，我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拓展，进一步思考并将“继承与创新”升进到哲学和文化或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积其所思，凝结为“中国哲学文化继承与创新研究”这一新的理论成果，换言之，《中国哲学文化继承与创新研究》是我前述研究项目的深化完善和新的进展。

我一直心契张岱年先生提出并完善，方克立教授积极倡导和深化的“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作为本书代序的方克立教授这一精神方向的一篇近论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文化观新的发展完善和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方克立先生在吸收张岱年先生有关思想、并与张先生共同倡导和坚持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以及借鉴学界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国文化现实发展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作了阐释。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重要论题之际，《人民日报》以“文化‘魂’与‘体’辩证关系刍议”为题发表署名文章说：“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必须正确处理文化‘魂’与‘体’的辩证关系，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抓住文化的‘魂’，创新和用好各种文化的‘体’，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做到形神兼备、强‘魂’健‘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 4 版）我感觉“马魂中体西用”论鲜明体现马中西“三学”关系，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导地位，审慎地改造运用传统“体用”范畴和观念，民族形式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更为彰显，能真切感受到古今中西的辩证综合和创新意义。

所以我认为，继承与创新是任何哲学和文化创生、超越、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进步发展遵循着这个必然原则，不可能违背这样的发展逻辑。应该说，哲学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的就是文化的“综合创新”。其落脚点都是在于“创新”。这种“创新”又是辩证的、综合的，因为它的时空前提或资源前提是“古今中外”，这就需要“综合”；综合的目的和前提是“批判继承”，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说“继承”是为了“创新”。这种在“综合”基础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既充分继承、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又具有真正超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现代品格，以高度理性和开放的胸襟，面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以文化创新为主旨，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为目标，着眼于古今中外，着力于文化创新，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探索一种新的思路 and 模式。方克立教授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著中论及：“‘综合创新’则是讲继承历史遗产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的发展不能只有继承，没有创新，而创新又必须以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页）因此我认为，文化“综合创新”，从继承说，是讲怎样继承，即批判地综合继承；在此基础上，必须要有所创造、有所创新，即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哲学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要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继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为主导、为指导，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文明成果，广泛地批判继承；创新是满足中国哲学文化自身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的理念及其过程和实践。综合起来就是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简言之即继承与创新。继承与创新包摄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开放性的方法层次。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与创新研究》，2008年4月作为西南民族大学科研项目立项，课题完成后获校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同时获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后期资助项目立项（项目批准号SC11H004），在此书稿出版之际，对西南民族大学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鼎力支持，表示诚挚谢忱！我的这次研究成果中，仍然包含着曾参与我前所主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徐纪律教

授、柳昌清教授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文字内容，感谢这两位教授仁兄的协助。徐初霞助理研究员为这一课题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她的部分研究成果，同致谢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风编审、储诚喜编辑精心审稿，颇费神思，多所辛劳，谨表感佩！

我仍将继续更为深入地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对现在这一成果中的不当或疏漏，期待读者批评教正。

杨翰卿

2011年12月16日

目 录

代序	“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	方克立 (1)
自序		(1)
导言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概论	(1)
一	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	(1)
二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2)
三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4)
四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取决于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9)
五	余论	(12)

第 一 篇

继承与创新：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和文化观考察

第一章	20 世纪立足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及其衍化	(19)
一	20 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背景	(19)
二	20 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内涵	(21)
三	20 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实质	(25)
四	“抽象继承”：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	(26)
五	儒学复兴论	(32)
第二章	20 世纪反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西化思潮	(39)
一	西化思潮的成因	(39)

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	(42)
三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全盘西化论”	(46)
四	西体中用论	(49)
第三章 20 世纪“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及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诸主张	(52)
一	中西互为体用论	(52)
二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55)
三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59)
第四章 20 世纪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一	辩证的分析,创造的综合	(63)
二	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70)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的文化建设理论 ..		
一	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的理论	(75)
二	邓小平理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风貌	(81)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文化创新,以创新为魂,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品格	(85)
四	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旨的观念特征	(93)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提高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问题	(97)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97)
二	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	(104)
三	实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111)

第二篇

中国哲学和文化继承创新、扬弃发展的理论研究

第七章 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实践标准 (一)		(123)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	(123)

二 实践及实践判别的意蕴	(128)
第八章 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实践标准 (二)	(135)
一 实践判别标准的预设性、实效性和相对性	(135)
二 实践判别标准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139)
第九章 继承性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	(152)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撷英咀华	(152)
二 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继承性弘扬问题	(161)
第十章 剔除性转换和矫正性纠偏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165)
一 剔除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165)
二 矫正性纠偏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174)
第十一章 批判性重构和融合性创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179)
一 批判性重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179)
二 融合性创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184)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当代转换与文化创新的	
当代特征	(191)
一 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191)
二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辩证转化	(195)
三 文化创新的当代特征和理论结构	(199)
四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的基本途径	(204)
五 结语	(207)

第 三 篇

中国哲学和文化继承创新、扬弃发展的个案考察

第十三章 关于“道”、“仁”两个观念渊源的考察	(211)
一 殷商时期“帝”、“上帝”、“天”的观念	(211)
二 西周时期“天”、“人”的观念	(213)
三 老子“道”、孔子“仁”的观念	(216)
第十四章 道家哲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222)
一 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222)
二 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225)
三 道家哲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230)

第十五章 墨学的创立及其文化创造精神	(238)
一 墨学创立的继承创新意义	(238)
二 墨学的文化创造精神	(242)
第十六章 韩愈儒学道统论的继承创新意义及其现代启示	(248)
一 韩愈以儒排佛实质是倡兴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独尊地位	(248)
二 韩愈道统论承前启后开宋明理学之先的创新价值	(252)
三 韩愈复兴儒学针砭时弊改造社会现状的实用取向	(256)
四 韩愈复兴儒学建立儒家道统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	(257)
第十七章 二程洛学继承创新的理论特征	(259)
一 二程继承创新的思想精神	(259)
二 二程洛学继承创新的理论内容	(263)
三 二程洛学继承创新的学术价值	(268)
第十八章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承继和创新发展	(270)
一 朱熹知行论的孔孟之承和二程之继	(270)
二 “闻见之外,犹有我不闻不见的道理在”	(274)
三 “格物致知”	(276)
四 “知先行后”、“行重知要”	(283)
五 知行“常相须”、“互相发”	(287)
六 朱熹知行论的主要特色和理论贡献	(288)
第十九章 从邵雍与宋代象数易哲学的发展看宋代易学的超越意义	(293)
一 邵雍易学哲学的承接和思想渊源	(293)
二 邵雍易学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和理论贡献	(295)
三 从邵雍易学哲学到南宋蔡元定、蔡沉的数理易学	(299)
四 朱熹融合象数、义理的易学哲学	(302)
五 宋代象数易哲学对中外哲学的影响	(304)
第二十章 许衡明体达用的实学思想和创新精神	(309)
一 许衡之学“自得伊洛”“以明体达用为主”	(309)
二 许衡学宗伊洛不辨朱陆的“明体”理论继承性	(310)
三 许衡“达用”实学的创新精神及成就	(313)
第二十一章 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	(320)

一 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和提升	(320)
二 新理学观照中国哲学精神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检讨	(323)
三 新理学所阐扬的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325)
四 新理学所阐扬的中国哲学精神的局限和偏执	(328)
主要参考文献	(331)